

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主体重构与认知调适

■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赵彦洁

当人在技术作用下发生深刻变化时,教育过程必然面临根本性追问:教育对象是谁,他们的认知如何运作,教育应如何回应。随着社会关系越来越多地被算法匹配、被平台重构,人的存在方式也在发生深刻变迁。为此,文章从主体角色重构、认知模式演变、认知调适路径三个层面展开分析,探讨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核心困局及应对策略。

一、主体角色的重构:从单一走向复合

(一)自我认知的数据化:从体验到量化
人工智能借助多模态数据融合,能够为学习者绘制较为精准的画像,把握其认知水平和兴趣偏好。可穿戴设备、行为采集系统将个人生理状态和行为轨迹转化为可度量的数字指标。从技术实现角度看,多模态数据融合涉及文本、图像、语音、生理信号等多源异构数据的联合建模,常用方法包括基于深度学习的特征对齐与注意力机制。这一技术的介入使个体越来越依赖数据来认识自己,“我数字故我在”正成为新的自我认知方式。从体验到量化的转变,实质上是自我理解从内在感受拉向外在数据,一旦这种认知方式过度依赖可测量数据,人的自我判断就可能被技术潜在规约,削弱主观能动性。

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在技术应用的同时坚持对完整性和真实性的探索。当教育对象逐渐被数据画像完全界定时,教育者需警惕:数据呈现的是真实的个体还是被技术加工过的人。如果只关注数据画像而忽略个体真实的情感体验,教育对象将沦为纯粹的数字存在。研究表明,单纯依靠行为日志构建的用户画像,其预测准确率在长期追踪中会出现明显衰减,这提示教育者应结合访谈、观察等质性方法进行交叉验证。

(二)主体边界的流动化:从单一到多重

随着元宇宙、数字孪生等技术的发展,人们可以在虚拟空间中同时拥有多个身份,主体身份不再是单一不变的实体,而呈现出复合形态。个体在不同虚拟空间中建立独立的社会关系。从系统架构来看,数字孪生技术通过实时数据映射构建物理实体在虚拟空间中的动态镜像,而元宇宙则进一步允许多重身份之间的异步切换与同步交互。当教育对象在不同身份之间切换时,教育者需要明确教育是否针对教育者的真实身份展开,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重新考量教育对象的真实范畴。

二、认知模式的演变:技术重塑思想的深层逻辑

(一)从沉浸式到脉冲式的认知节奏中断
人的注意力被短视频与算法推荐技术切割,信息获取不再通过长时间沉浸式学习。短时间、碎片化、快餐化的浏览方式成为主流。相应地,认知节奏从持续不断转为时断时续的脉冲式节奏。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当个体频繁切换注意目标时,前额叶皮层需要反复进行任务重置,每次重置约耗费数百毫秒至数秒的认知资源。高频次的切换会导致累积认知损耗,降低深度加工的可能性。

深度阅读所需的沉浸时间被技术打破。当信息以碎片化方式呈现,系统性思考便失去认知基础。媒介形式深刻影响思维方式,在算法推荐的媒介环境中,人的思维正从深度转向速度。实证研究显示,短视频平台的用户平均停留时长约为15秒至30秒,超过60%的视频在前5秒内即被划走。思想政治教育历来依赖系统的理论阅读和深度思考。当认知节奏被技术加速,教育必须寻找与之对话的新方式。有研究指出,若人们回避需长期投入的理论学习,满足于浅层知识的增加,思想政治教育对系统知识建构的需求便难以实现。

(二)推理转为外包的思维代偿过程

搜索引擎、生成式AI正成为人的外接大脑,遇到问题先搜索逐渐成为下意识习惯。这种现象称为“认知外包”——人们越来越依赖数字设备完成原本属于自身的认知任务。技术的便利性替代了原本需要人脑完成的记忆、推理、整合等功能,人类的思维过程出现技术代偿。从认知负荷理论来看,外部工具的介入将部分工作记忆负担转移至环境,短期内提升了任务完成效率,但长期依赖可能导致内在认知结构的重塑与某些推理通路的闲置。

算法承担越来越多原本属于人的认知功能,一个悖论就出现了:人的思维能力不仅没有提升反而可能出现退化。一项对照实验发现,长期使用导航软件的被试在空间路径规划任务中的表现显著低于未使用组,且其海马体灰质体积呈现减小趋势。类似地,过度依赖生成式AI进行文本摘要的学生,在独立归纳段

落主旨时的准确率下降约20%。思想政治教育者有必要引导教育对象,减少对搜索引擎的依赖,转向系统性的知识建构,提升驾驭人工智能的能力。

(三)算法诱导对价值判断的影响

算法通过不断推送同质内容强化用户原有的认知倾向,使用户形成自我强化的认知闭环。算法推荐让人对不同于自己的意见保持防御性排斥,只相信更符合自己立场的信息。这样一来,价值判断越来越依赖情感共鸣和立场认同,而非理性思考。从推荐系统的工作机制看,协同过滤与基于内容的过滤都会产生“过滤气泡”效应,用户被持续暴露于与其历史行为高度匹配的信息中,异质性信息的接触概率呈指数级下降。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打破认知闭环,确保价值引领的方向性正确。教育不能仅停留在内容层面,更应积极介入算法机制,防范可能出现的信息偏向风险。

三、认知调适的路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性回应

(一)教育者角色的再定位:从知识权威转向认知引导者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形式上把教育者的主体地位转移给机器,使教育者面临去主体化的挑战。原有的知识垄断受到冲击,权威主导型的教育方式被迫变革。教育者角色转型的核心是从知识权威走向认知引导者。教育者不再以知识占有量建立权威,而是通过帮助教育对象理解信息、识别真伪、洞察算法逻辑来赢得信任。关键在于教育者需提升数字素养,能够识别算法黑箱的潜在影响,引导教育对象理性看待技术。教育方式需从单向灌输转向对话引导,在教育对象与技术的互动中介入教育者的价值判断。

(二)教育对象主体性的守护:超越算法依赖

当个体过度依赖技术时,可能会陷入“算法比我更了解我”的认知误区,导致自主思考能力被削弱。教育对象可能因长期依赖智能工具而丧失主动思考的动力,学习变得被动化和表面化。守护教育对象的主体性,需要从多个维度入手。

大数据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风险识别与应对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菲

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正加速实现数据驱动、智能化协同以及个性化定制的范式转型。通过数据采集与分析,教育者能够更全面地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实现教育内容的精准供给与教育过程的动态优化。然而,技术应用的双刃剑效应同样在这一领域显现,如何在享受技术红利同时有效防范风险,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大数据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形态

大数据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其一是精准画像与个性化教育。通过采集学生在网络平台、学习系统、校园生活中的行为数据构建“数字画像”,从而识别学生的思想动态、兴趣爱好与成长需求,实现教育内容差异化推送,使思想政治教育从传统的“漫灌式”转向“滴灌式”,提升教育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其二是动态监测、预警干预。大数据技术能够对学生思想行为方面的数据进行常态化的追踪、分析工作。一旦数据出现异常波动,系统就能及时发出预警,以此助力教育者实现“早发现、早介入、早干预”。

其三是过程评价、效果反馈。大数据技术能够达成对教育全过程的动态记录、量化分析,给教育效果评估提供客观依据,促使思想政治教育从经验驱动转变为数据驱动。

二、大数据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风险识别

技术帮助并非仅仅是单向度的那种简单的增益过程。在数据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当中的时候,同时就会产生一系列风险,而这些风险被归纳为四类。

(一)数据主义倾向与人文价值遮蔽

数据主义持有一种观点,即认为所有事物都能够被量化。一旦这种趋势渗透进思想政治教育领域,那么就有可能出现“数据本位”超越“人文本位”的情况。有学者发出警告,在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存在着数据主义方面的隐患,“数据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矛盾可能会引发主流价值引导失去作用、教育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失去平衡等风险”。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之处在于对价值观进行引导、对人格进行塑造,过度依靠数据指标可能会使教育过程被简化成技术操作,教育原本应有的温度和深度被工具理性给掩盖住了。

(二)主体性消解与人机关系失衡

大数据技术深度参与其中,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关系发生了重塑。一方面,算法的“智能推荐”功能,有可能让教育者从原本的“主导者”地位,逐渐转变为仅仅负责“执行”的角色,另一方面,学生若是过度依赖算法,极有可能使其批判性思维出现弱化的情况。有学者指出,在人机关系、人机关系和人际关系里,主体性偏移已然成为比较突出的隐忧。

(三)算法偏见、信息茧房与价值分化

算法在设计、数据选取等这些环节中有可能

可能会嵌入价值偏好,进而产生算法偏见,使得主流价值导向遭到扭曲。“信息茧房”效应会让算法依据用户偏好来推送同类信息,致使学生陷入同质化的闭环之中,视野变得狭窄,对不同观点的包容度有所降低。

(四)数据安全与隐私泄露风险

数据采集涵盖了学生网络浏览记录、心理健康数据等敏感信息。要是管理出现问题,就会侵犯学生隐私权。有研究表明“数据资源治理缺少统一标准”“数据安全法律法规、制度模式不完善”是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

三、风险应对的实践进阶

对于上述所涉及的风险而言,要从价值引领、素养提高、制度规范、技术优化这四个方面的着手建立一个系统且完整的应对模式。

(一)价值引领:确立“数据—人文”协同的新数据观

要应对数据主义倾向,最为关键的事情是树立正确的数据观。数据是用于服务人的发展的一种工具。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数字化转型时必须坚守“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要保证技术应用一直服务于育人目标。当数据与人文出现冲突之时,人文价值具备优先性。

(二)素养提升:加强数字素养教育

人的因素对于防范技术风险而言至关重要。一方面需要强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大数据素养培训,促使他们既能熟练运用数据技术,还能清晰认识到技术存在的局限性,防止成为算法的被动执行者。另一方面要加

强对学生的算法素养教育,培育他们批判性使用信息的能力,助力学生识别并突破“信息茧房”。

(三)制度规范:完善数据治理与伦理规制体系

制度建设乃是风险防范的根本保障所在。要加快建设针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数据在采集、存储、使用等各个环节的制度规范,清晰明确数据所有权、使用权、隐私权的边界。并且还要建立数据伦理审查机制,针对技术应用开展前置评估、过程监督。

(四)技术优化:以可解释、可干预的算法消解偏见

算法风险的技术性应对措施,重点在于促使算法从“黑箱”状态转变为“透明”状态。这就需要鼓励开发能够进行解释的算法模型,以便教育者可以明白算法决策所依据的内容、背后的逻辑。并且,在算法设计过程中要预留人工干预的接口,以此保证教育者拥有对算法推送内容的最终审查权,避免算法偏见出现自我强化的情况。

四、结语

大数据技术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能被忽视的风险挑战。数据主义有可能会遮蔽教育的人文底色,算法偏见有可能致使价值分化,技术依赖有可能削弱人的主体性。面对这些风险,正确的做法是在积极迎接技术带来的好处的同时,要保持清醒的风险意识,用价值理性来引导工具理性,通过制度建设来防范技术出现异化,从而最终达成大数据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健康融合、协同发展。

案例教学在党校干部教育培训中的应用

■台儿庄区委党校 赵焯

政策在基层的落地情况,也要呈现干部开展实际工作时遇到的难点和困惑,让学员在案例研讨时能产生共鸣、主动思考。

第二,设计符合教学规律的流程,突出学员的主体地位。常规的案例教学会设置固定环节,具体包括案例展示、问题抛出、分组研讨、全员交流、教师点评。授课教师先简要说明案例的背景和核心信息,再抛出有思考空间、存在不同讨论方向的问题,引导学员围绕对应内容开展研讨。分组研讨环节中,学员要结合已经掌握的理论知识拆解分析案例,给出自身的思考和对应的解决思路。全员交流的环节里,每个小组派代表分享本组的讨论结

果,不同思路互相启发、互相补充,最终形成更完整的认知。授课教师会在合适节点开展引导和追问,帮助学员梳理思考脉络,强化认知,最后做总结点评,提炼出案例中包含的理论要点和实际工作方法。

第三,案例教学要和理论教学做好衔接,在理论教学的基础上做好内容深化和边界延伸。实际推进教学活动时,可以先完成理论内容的讲授,帮助学员吃透基础的概念、原理与相关方法;再依托案例还原的真实场景,让学员尝试运用、验证学到的理论内容,也可以先抛出具体案例,调动学员的学习兴趣和意识;再带领学员梳理案例的内在逻辑,总结出

案例教学属于一种特定教学方法,授课方会结合预设的教学目标与内容安排,挑选真实、典型的事件或场景,引导学员开展分析、讨论和决策相关活动,让学员在参与过程中锻炼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党校干部教育培训中引入案例教学,可弥补纯理论讲授存在的短板,帮助学员结合具体场景理解、运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高处理复杂工作局面的实际能力,达成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的教学目标。

案例教学在党校干部教育培训中的具体应用如下。

第一,案例的筛选要同时具备代表性、典型性和时代性。党校学员大多来自不同的岗位与层级,各自遇到的现实问题差异大,案例选择要做到贴合基层实际、贴合中心工作、贴合干部思想动态。同时满足政治性、政策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要求,既要体现党的路线方针

对应的理论要点。无论选择哪一种教学顺序,都要理清理论和案例的内在逻辑关联,避免案例教学变成没有内核的故事分享或零散的经验交流,保证学员既能借助案例吃透理论的核心内涵,又能用学到的理论处理实际遇到的问题。

第四,要做好案例教学成果的转化与应用工作。培训全部结束后,可要求学员提交案例分析报告或行动方案,把课堂上研讨形成的共识转化为优化自身工作的具体举措;也可安排学员返回工作岗位后,围绕本单位、本地区的同类问题开展行动学习,把案例教学中学到的方法与思路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定期反馈应用效果,构建“学习、实践、反思、再学习”的良性循环,切实实现案例教学服务干部成长、服务党的事业的核心目标。